

解放初80多万上海工人一起学识字

上世纪50年代初,上海工人中,文盲、半文盲大约占75%,在纺织工人和搬运工人以及一些小企业中文盲就更多了,全市职工中文盲半文盲的人数超过70万。

以笔者母亲为例,她也曾是其中的一位工人文盲,解放前因为家庭贫困,小小年纪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来打工谋生,那时生活相当艰苦,根本没有机会进学校读书,俗话说“大字不识一箩筐”。但是后来得以脱盲,能写一些包括姓名、住址等简单的文字,还能看书读报,写短信,这一切都得益于解放以后轰轰烈烈开展的扫除文盲运动。



全国劳动模范杨富珍(右)

样的典型,她成了全国著名的学习模范。当年,她已经60多岁了,虽然眼睛不太方便,也积极参加扫盲运动,努力学习文化,她在学习到半文盲的程度以后,就开始写字、写信,还怀着一个老工人朴素的感情,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毛主席办公室给她回信,鼓励她积极学习文化,为建设新中国做更多的贡献。

我在档案材料中,找到60多年前施小妹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,这封信刊登在1953年1月1日的劳动报上。

施小妹在信中写道:今年国庆节我向您报告了学习成绩,很快就收到您的回信。您指示我继续努力工作,好好学习,永远做群众的模范。所以我每天清早起来写字,每天工作的时候就在想,怎样才能做群众的模范,我把我自己参加速成识字班的体会,告诉给老年工人和青年工人,鼓励他们努力学习。

这封信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,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扫盲识字运动。

“扫盲班”走出全国名人

当年,通过扫盲识字成才的工人有许许多多,在他们中间还产生了许多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、三八红旗手等先进人物,以及出色的领导干部。

全国劳动模范杨富珍是童工出身,解放前,在日本人开的纺织工厂里面做苦工,经常被那摩温(工头)打,每天做12小时的活,吃一些馊粥馊饭,后来在一些地下党员的教育帮助下,参加革命工作,散发宣传解放区革命的传单。当时散发传单她对传单上的字一点都不认识,只知道那是解放区的好消息。真是急呀,深深地感到没有文化的苦。

解放以后,杨富珍参加扫盲识字学习。纺织厂一般安排在晚班下班以后学习,那么一个晚上没睡了,学习时就要打瞌睡,这时她就捏自己身上的肉,捏了痛就不打瞌睡了,身上却捏得都是一块块青的,这样老师在讲课,都听得进去了。回到家里以后,妈妈看到身上怎么一块块都是青的,只能说是摔了一跤。

杨富珍努力学习文化,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色。1951年,以她的名字命名的“杨富珍工作法”被纳入国家的五一织布法,成为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之一。杨富珍被评为劳动模范,1953年应邀去北京开会,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。

这里记述的,仅仅是解放之初上海扫盲识字运动的几个片段。其实运动高潮接连不断,从195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66年,前后共有80多万工人参加这一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。

16年间,80多万工人学识字摘掉“文盲”帽子,这真是一组了不起的数字!

吴頔 来源:上观新闻

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

扫除文盲,建设新社会,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主张。而新中国成立后,在城市里,为了让工人当家作主,提高大家的受教育程度,巩固人民民主专政,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扫盲的重要性。

根据中央政策,上海市从1949年起兴办成人教育。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以政治启蒙为主。当时,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年底以前,便派员到各区办事处及各次大会作专题报告,吸引前来听讲的人数万余计。此外,又举办了13所学习班,学员共8095人。先以工人积极分子为教育对象,此后产业工会也开始举办政治学习班。工厂夜校则用读报、讲课等方式开展政治教育,成为上世纪50年代上海大规模开展扫盲识字运动的前提和基础。

据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李家齐老人回忆:“当时,解放以后中国工人文化程度相当低,如一些纺织工人、码头搬运工人都不识字的。那就碰到一个问题了,解放了,工人阶级变领导阶级了,工人走到马路上连路牌都不认识,那怎么领导呀?那么大家就酝酿了扫盲。工人有这个强烈的要求,我们总工会就感到这件事要抓起来,就搞起了扫盲运动。”

1950年9月,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。会议明确指出:“推行识字教育,逐步减少文盲。”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,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,并与劳模亲切握手、合影。于是,一场“政府领导、依靠群众组织”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,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。

全家一起抄教材

关于解放初期上海开展扫盲运动的情况,《上海市总工会90周年大事记》中也有相关记载:1950年4月上海工会文教干部会议召开,总工会主席作了关于开展识字运动的报告,动员全市的工人阶级积极开展识字学文化运动,拉开了全市扫盲运动的序幕。

扫除文盲,明确提出“推行识字教育,逐步减少文盲”,当时规定识字教育的标准是在3年内认识常

用字1000个以上,并且要具有初步的读、写、算的能力。那时中央人民政府设有政务院,政务院发文件决定,对工人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,规定由政府统管,政府制定教育制度,工会负责具体工作。工会在工矿企业积极组织办学,成立教育机构、招聘人员、培训师资、安排场地、编写教材,当年的扫盲运动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,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的学习积极性。

扫盲教材由教育局根据工人学习的实际需求编排,统一编印。识字的内容从教张三李四的姓名开始,再教上下左右、来来去去、前前后后等,由浅入深,逐步发展。同时,在文化学习中安排政治学习的内容,介绍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,控诉地主压迫,忆苦思甜,发扬先进,还宣传传统文化。不但教工人识字,而且也教工人怎样做人,懂得道理,培养优秀的品质。识字教材也很讲究艺术性,所以很受工人的欢迎。

曾有位工人在下班途中的公共汽车上遗失了一本识字教材,学习受到了影响,焦急得不得了,结果发动全家人一起抄写,抄写了好几天,搞成了一本手抄本教材。

菜场里弄全民扫盲

扫盲的具体方针是:先工人后一般群众;先产业工人后一般工人及劳动人民;先国营厂后私营厂;先大厂后小厂;先有条件的厂后难的厂。在方法上,国营厂由厂党委统一领导“包干”,私营厂由工会负责“包干”。在厂内推行速成识字法的一般方法是:先办实验班再逐渐推行;先教干部后教群众;先教半文盲后教文盲(培训教师);先办脱产班后办业余班。

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:工人群众经过250小时左右(包括复习时间在内)的学习后,能认识2000字上下,阅读通俗读物。

那个时候,工厂的车间还出现了帮助识字的小黑板,上面写了几个字,如我们工人最光荣,劳动最光荣,过了几天再换几个字,你是摇纱车间,他是细纱车间,还写一些革命电影的名字等等。大家可以这样轮流写,相互帮助一起提高学习水平。

当年有条件的工厂可以开办夜校,一些小厂只能联合起来办校,称为联合夜校;更有一些小的商店,小的企业等单位只好几个人拼起

来,请个识字的人来当老师,开办一个小小班。扫盲工作还从工厂发展到社会的各个地方,包括菜场和里弄,被称为全民扫盲。

小菜场里面有许多是白天卖豆芽、卖咸菜、卖豆腐、摆摊头的小贩,他们一般早上到10点就可以下班休息了,下午和晚上的时间比较多,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?也动员他们集中起来办扫盲班,大概每天教两个小时,教他们识字,有时也请在校的学生来当老师,这些小贩因为也可以读书了,感到很开心。

一封给毛主席的信

1950年以后,上海市便有市立工人夜校49所,学生17000余人,80%以上都是18~30多岁的青年产业工人。此外,7所市立业余补习学校也兼收职工,各业工会主办的106所学校,共有学生15900名。为了加快扫盲进程,1952年,上海市响应中央号召,在全市有重点地推广“祁建华速成识字法”教学实验。

当然,如此大规模的推广运动,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在开展扫盲学习运动的过程中,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有些工人从农村到上海来打工,年龄比较大,接受能力差,也没有文化基础,这样就造成识字的速度比较慢,看到其他工人学习进步快,识字多,总以为是自己笨,脑子不好使,慢慢地就打起了退堂鼓,不想再学习了。还有的女工要参加扫盲学习,占用了一定的业余时间,丈夫下班回家后,看到家里老人没有人照顾,孩子在一边大哭小叫,就抱怨说识几个字有什么用,识字又不可以当饭吃,反对她们参加扫盲学习。这时工会干部就要上门去做工作,有时还要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,使扫盲学习得以顺利进行。

工厂里办学校,上早班、中班、晚班的工人都需要老师,上常日班的工人也要老师。大量地办班,师资力量不够怎么办?这时,“小先生”们就被发动来上课,他们大多是原先的学员,识字成绩突出,就被请来当老师,但不是专职的老师,所以叫“小先生”。“小先生”也有奖励制度,也开会进行评比,表扬教学先进“小先生”。

当年的扫盲学习高潮中,还涌现了上海国棉一厂老工人施小妹这